

叶昌炽字号及藏印考

王立民

摘要:清末民初著名目录版本学家、金石学家叶昌炽,同时也是著名藏书家,其字号、室名众多,许多都治成印。本文从考证叶氏字号、室名命名原由入手,对其藏印进行考证。

关键词:叶昌炽; 字号; 室名; 藏印

中图分类号: K8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8)04-0068-03

中国人钤盖的藏书印,又称藏印、藏书章,表示对书籍的购藏或拥有、阅读、鉴赏等,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些印章从形制到内容林林总总,反映了藏书家们千差万别的个性差异。藏书章印文所记内容,足为书林、印林之美谈。一本书流传数代,钤盖无数拥有者、鉴赏者的形形色色的印记,不仅给风格各异的原本版面增添了新的景致,而且其中许多藏书印及其蕴藏的藏书故实,还为后人增添了无尽的遐想与乐趣。

叶昌炽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金石碑版研究专家,与许多时人一样,也有着诸多的字号、室名,而这些字号、室名部分刻为藏书印,于此前人已多有道及。然目前众家论著所载远非叶氏字号、室名与藏书印之全部,如《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载记叶氏字号室名凡 16^①,是目前所见记录叶氏字号、室名最多者,但仍有一些遗漏,且受书体限制,对叶氏字号、室名的来历及与藏书印的关系未能解释。钱太初先生《跋叶菊裳先生所藏自用的印章》文^②,辑录叶氏藏印 24 方,并述其中部分印章得名缘由,是目前所见单篇文章中介绍叶氏藏书印最多

者,但半数以上论及的是姓名印,涉及室名及字号的仅 11 个,仍有遗漏,如“几希野叟”、“双云阁”等,且对叶氏藏书印得名原由的解释也有待补充。

笔者在研读叶氏《缘督庐日记》及其诗文集时,留意于叶氏字号、室名及藏书印的记载,兹对叶氏藏书印的相关情况略作考证,以飨同好。叶氏藏书印的种类繁多,兹分类论述如下。

一. 姓名字号类

叶昌炽生于道光己酉年(1849)农历九月十五日。农历九月菊花盛开,所以九月又称菊月。又汉昭帝《黄鹄赋》中有“黄鹄飞兮下建章,羽肃肃兮行踔踔,金为衣兮菊为裳”句,故叶以“菊裳”为字。又因鞠、菊通,裳、常通,所以又写作菊裳、菊常、鞠裳、鞠常。以上几种写法,在叶氏日记及诗文中都曾出现,如《缘督庐日记》始于同治庚午年(1870),署名即“长洲叶昌炽鞠常氏记”;此外又有“鞠裳记事珠”白文方印^③,而辛未年(1871)、壬申年(1872)则署名“长洲叶芳揆鞠裳氏记”;光绪壬寅年(1902)二月初九日:“得孙慕韩书,传示吴经才电询行期,云年内棚数多,出京宜速。即属其附电九字,曰‘鞠常准月尽出京。道谢’”;光绪丁未年(1907)十二月廿二日:“晨起见案头一函,启视,首五字曰‘鞠裳门下士’”。由此可见,前人于同辈间称谓,用字比较随意。又如叶氏好友王同愈《栩缘日记》中,对其统称“鞠常”;

① 《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77-778页所载16个字号、室名为:鞠裳、菊裳、奇觚、缘督、惺居士、辛白谿、霰淡庐、双云阁、奇觚庵、治庸室、华桥老屋、几希野叟、缘督庐主人、治庸居士、五百经幢斋、佛顶遵胜陀罗经室,其中“辛白谿”误为“辛伯谿”。

② 《苏州文物》总第6期,1992年。此文蒙苏州文育山房江澄波先生复印寄赠,谨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7-05-23

作者简介:王立民(1964—),吉林榆树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专业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③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有“记事珠”一篇,载人送宰相张说一颗珠子,名为记事珠,“或有阙忘之事,则以手持弄此珠……事无巨细,焕然明晓,一无所忘”,后世遂以“记事珠”称代日记。叶氏此印即取此义。

夏孙桐作《奇觚庐诗集序》，称其为“同邑叶鞠裳侍讲”；其同年好友王颂蔚之子王季烈为《缘督庐日记钞》所作序，称“《缘督庐日记》为我年丈叶鞠裳侍讲之遗稿”。可见，叶氏之字，“鞠”、“菊”，“裳”、“常”并用，而以“鞠裳”、“鞠常”为多。

叶氏和“菊”相关的别号，还有“治廬”和“治墙”。丙戌（1886年）正月初七日日记：“……枕上作藏书偈曰‘无水火兵灾，无蟪蛄鼠劫’，‘永离一切苦，如我佛所说。治廬居士和南说偈’。拟以此廿八字镌一方印。再以青田石船一无量寿佛像，每书钤此二印，为书忏悔。又拟刻一印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堂’，‘佛’字居中，较大，余八字周围刻作镜式……”。这段记载涉及到叶氏的三方印，第二方印中的“治廬”即和“菊”有关。《说文解字·艸部》：“菊，大菊、蓬麦。”《段注》：“《夏小正》：‘九月荣鞠’，鞠，艸也。”又“字或作菊，或作鞠，以《说文》绳之，皆段借也。《释艸》：‘鞠，治墙’”。段玉裁认为许慎所说“治墙”，当“别是一物”。尽管在古人那里“菊”和“鞠”非是一物，而“墙”和“廬”也有差别，但叶氏为自己开列的读书目录中有《说文解字》，而且曾遵师命校订过《说文解字注》，对“菊”、“鞠”与“治墙”之间的关系自然明了，所以叶昌炽还是把它们都拿来用做自己的字号来用了。

甲申（1884年）二月十六日日记：“束屦怀，借仿宋绍康熙本《谷梁传》四册，黎莼斋星使在东瀛摹刊，旁有金泽文库印，雕造楮印……有唐写《汉书·食货志》，残本《玉篇》，宋刊《雕玉集》，皇氏《论语义疏》。将来星使瓜代，所刻板皆捆载来吴，必购之为治廬藏书生色也。”此处“治廬”即“治廬室”之简称，故又有“治廬居士”之称和“治墙室金石图书之记”印。叶氏与“菊”有关的别号还有“霜下杰”，盖取陶渊明《和郭主簿》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之句，“霜下杰”即菊也。此外，叶氏字号和“菊”有关的，还有前面提到的“芳揅”。揅，发舒、舒张之意，又有美艳、光照之意，也和“菊”有关。“芳揅”体现了叶氏的人生追求。叶氏晚年，又取《庄子·养生主》“为善无近名，缘督以为经”文意，以“缘督”为号。“督”即督脉，为人体奇经八脉之一，其循行路线起于小腹内，从会阴部向后，行于脊里正中，上至头顶，继续前行，至于鼻柱及上齿。督脉之大部分循行路线与人的脊柱重合，故处于人体中分线上，庄子取其“合中”之意。所以“缘督”即为守中合道、顺

其自然之意。“督”也写作“𦵏”，《说文·衣部》：“𦵏，背缝。”段注：“衣与裳正中之缝相接也”。盖叶氏自号“缘𦵏”，即取正中之意，观其一生行事，此号确实恰如其分。其燕居处既名“缘督庐”，则本人自然为“缘督庐主人”了。叶氏还有“颂鲁”一名，其含义为作为人臣颂扬君主功德的美好行为，典出《诗经·鲁颂·閟宫》郑笺孔疏。目前所见叶氏姓名及字号印最多，此文则主要探讨其字号印，得名原由已如上述。

二. 身世经历类

将自己的身世经历撰为印文，刻印钤于藏书上，代不乏人。人的身世经历千差万别，印文也随之变化多端。如明代杨继振的一方长达252字的藏书印^①，即展示杨氏家世经历及生活情趣。又如“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印，则将钱氏夫妻相濡以沫、又均嗜书如命之情态充分展现。小小藏书印，的确可以折射读书人的人生百态。

在历代藏书家中，叶氏应属生活颇为不幸者。叶氏辛丑（1901年）五月初六日日记：“仆四十后有三恨：功名之偃蹇不与焉；一子殇，一弟孩；一亲串中除康吉外无识字之人。獬狷天性仁厚，而与读书为仇，好仁不好学乃至此，亦可叹矣。”然而，不幸的事故尚未结束。叶氏中举不久，即遭父丧。情同手足的二弟病歿不到一月，次子即夭折。赴京会试时，因闻慈母病重而弃考。慈母病逝后，叶氏哀毁欲绝，大病一场，此后多年会试不中，生活极度艰难。从《日记》己卯（1879年）八月廿四日的记载看，叶氏为家计替人抄书过目，或者忙于课徒，以至于没有功夫教授自家子弟。又戊寅（年）八月初十日日记：“连日馆课倥偬，耳疲于听，口疲于讲，手疲于写，较诸子未赴试前更形繁剧，并楷亦不暇作矣。衣食累人乃至于此，可谓浩叹”。其生活实在不轻松。然而，辛勤忙碌的结果，却没能保住子嗣。庚戌（年）四月十一日日记：“三子一女先化去，此尤人生之至戚，荼毒之极哀。”子女在二十几年间先后离他而去，特别是能承父业的长子恭彝病逝，使叶氏所受打击尤大，日记中曾多次慨叹后继无人。己酉（1909年）八月初一日日记：“……病必如期而至，但未有如此次之甚耳。即自制一额一联，生挽额三字曰‘哀此菰’，联上曰‘天

^① 向来讹传字数最多的藏书印为杨继振的195字藏书印，杜泽逊先生《关于“文字最多的藏书印”》（《文献》1999年第4期第24页）于此有纠正。

之生是使’，下曰‘离人而立于’。客问何以歇后，答之曰，此翁尚有后邪？署款即可称‘歇后翁’”。此歇后翁非歇后语之邂逅，乃后代消歇、断绝之谓也。庚戌年四月，相依为命的老妻也先他而去，加之同胞弟妹先后亡故，过继的孙儿也不幸夭折，叶氏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因此以“硕果堂”“惺居士”为号。丁未（1907年）九月初九日：“……呜呼，寒门薄祚，不肖就木已近，男丁惟吾第一人为硕果”。十二月十一日：“……余藏书处曰‘硕果堂’，藏碑处曰‘奇觚廋’，藏梵夹处曰‘五百经幢馆’，著书处曰‘辛白簃’，燕居处曰‘缘督庐’，迎宾处曰‘仁频馆’。过屠门而大嚼，皋庖赁舂，实无一椽。”“硕果堂”之硕果，既可以指其搜罗之成果，而又含硕果仅存之意。丙辰（1916年）十月初一日日记：“阴寒，昼夜雨。亡儿二十周年。惺独余生，尚未入地，言之可痛。”其号“惺居士”，即孤独、穷独之意，《日记》中多次出现“惺独余生”字样。日记中又自称“惺叟”，癸丑（1913年）八月十九日：“缘督力疾补识……病之渐瘳，未始不由于此。惺叟再记。”一家老少四代多口人，最后只剩下叶氏一个人，“惺独余生”和硕果仅存相差无几。

叶氏还自号“几希野叟”，从《缘督庐日记》记载可知其原由。戊申（1908年）十一月十九日：“不见三妹……作《几希野人引》一首”，其文如下：

几希野人引（并序）：余今年六十矣，惺独余生，屏居山野，长为农夫以没世矣。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今之世竞进于文明，野所讳也，岂知舜亦尝为野人哉。子與氏又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禽之界何去何从，几希乎，几希乎，不为人将为禽乎？趺然空谷之中，庶几有似人者乎？爰于初度之后，自署曰“几希野人”，作诗以自警云。（原诗略）

叶氏1902年五十四岁，始被派到遥远的甘肃做学政，短短四年后，即因清廷裁撤学政而告病还乡。还乡后的生活每况愈下，加以老病缠身，所以才有“几希野人”之叹。叶氏家在苏州花桥，他称之为“花桥老屋”，数十年间，花桥老屋曾几次易手，或出售，或出租，最终将破败老屋购回，居此直至病故。叶氏因此自号“花桥老屋”，并以此治印。

叶氏回乡后，潜心于著述，再无仕进之心。甲寅年（1914）五月，江苏省长韩紫石曾写信邀请他

出任江苏省立图书馆长，他以“衰病余生，精铨销竭。守先待后，匪所敢承。非高介石之贞，但以朽木自废”为由加以拒绝。叶氏言身体原因属实，但婉拒的根本原因在于叶是不愿做民国官员，仅仅想做“寂鉴遗民”而已。就连其居处，虽几次搬迁，也尽可能选择静谧之所。

叶氏收藏经幢成癖，因此除了命名自己的斋馆与经幢有关外，即使印制信笺也无不与此有关。其丙辰（1916年）二月十三日日记载“出篋衍旧纸两刀，幢笺板两分，藏书造像板一分，付印”。今所见以陀罗尼经文为衬景的信笺纸左下角有“人间方外”四字印纹，类朱文方印^①，至于是否真有此印，则不得而知。倘有，或许归到经历类不为过吧。

三. 斋馆收藏类

古代文人墨客，为储藏自己的藏品，不乏以重金造广厦巨室者，如晚清四大藏书家，虽无一任高官者，都曾专门建藏书楼以储书。而更多的人既非专门藏书家，又限于学术兴趣和生活境况，其藏书室似乎仅局限于自家居室。叶氏属于后者，其《缘督庐日记》丁未（1907）十二月初四日《两云麾吟》有自注云：

余藏书处曰“硕果堂”，藏碑处曰“奇觚廋”，藏梵夹处曰“五百经幢馆”，著书处曰“辛白簃”，燕居处曰“缘督庐”，迎宾处曰“仁频馆”。

叶氏喜爱的《云麾碑》得而复失，又失而后得^②，故其有一藏书印为“双云阁”。辛亥（1911年）八月初五日，“午后摊卷欲写，而伯南至矣，携赠《归元恭集》二册。寤寐求之非一日，惜是铭笔写机器印，不啻公私簿籍，岂堪插架。出大小石章四方付之，请代求祝心源铁笔，一曰‘双云阁’，谓宋拓《李思训》，金拓《李秀》，两《云麾》也；一曰‘奇觚廋’；其二联章名字印。以拙稿各一部为贽，先携《语石》去。”上面诗中最后一句提到的“奇觚廋”，为叶氏的藏碑处。“奇觚”者，奇书也。史游之《急就篇》有“急就奇觚与众异”句。“觚”之一意为木简，即古代书籍之一类，故“奇觚”即奇书、罕见之书。叶氏限于家境，无条件购藏唐刻宋槧，然而在石刻及乡邦文献的搜集上，收获颇丰，

① 赵一生 王冀奇主编《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中册464-46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次印刷。

② 叶氏共得两种《云麾碑》，其中一种一时翻检不到，以为丢失，故有得一碑失一碑之说。

藏有不少孤本和罕见的抄本，所以将其藏碑处（亦可称为藏书处，因许多拓本亦装订成册，故可视为书籍）名之为“奇觚廋”。乙巳（1905年）十一月十四日：“午后祝心渊来，始知其尚未成行。携赠南昌大安寺铁香炉款，杨吴大和五年造。又以‘奇觚廋’、‘双云阁’新雕两印先见归，据言是微生之醢，但不告某人刻。虽浙派，腕力尚清劲。”

叶氏自弱冠即开始专注于碑拓，经数十年累积，至暮年已积攒至八千余通，其中仅经幢即达五百余种，故命其藏处为“五百经幢馆”。乙酉（1885年）六月初九日：“……同乡高铁耕来，以《乐中大同元年慧影造像》见贻，并有余刻‘五百经幢馆’石印二方，一阴文，一阳文。”五百经幢馆的主人自然是幢主，故其号尚有“幢主”。其时叶氏还不到四十岁，就有如此多的藏品，当属收获颇丰。而从“过屠门而大嚼，皐庑赁春，实无一椽”之注可见，叶氏诸多的馆庐，实仅一处而已。

叶氏之碑帖收藏，以实用为主，且佛教经幢为其特色，其所收藏佛教经幢上大多有“陀罗尼室”、“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字样，所以他尚有自号“陀罗尼室”、“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堂”，均已治印。另有“无量寿佛”肖像印。

叶氏还曾辑晋及刘宋时十九种地理游记类书籍成《殷淡庐丛书》（稿本），故其号又有“殷淡庐”。辛亥（1911年）八月廿四日，“……录稿既竟，复附一律，十六叠前韵：

郝滕讵敢抗齐秦，牛耳骚坛拜后尘。酬唱续追临顿里，新诗传诵泖湖滨（伯齐农部葺二陆草堂，自松郡驰书乞君题咏）。芸签插架编分乙，齏臼颜籀印借辛（君自署作诗之所曰辛白籀。辛稼轩有辛字印）。著述名山为君寿，岂惟花管播芳春。

叶氏的藏书处“辛白籀”即因此得名。此外，叶氏以饾语形式写成的《庚子纪事诗》，后改名为《辛白籀诗饾》。

四. 阅读鉴藏类

此类印实际上包括两大方面：读书印、鉴赏收藏印。读书本身本来和藏印没有任何关系，但读书人和藏书家往往合而为一，既表示自己不但曾经拥有过某书，又向人昭示自己曾经读过某书，而且越是版本罕见之书，越是要在上面留下印记，似乎已经成了古代文人的传统。好读之书、罕见之书而无

款识，简直不可想象。

叶氏读书数十年，经眼的珍本秘籍无数，但这些书绝大多数是师友故旧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则少而又少，所以能够在上面钤印的实在有限，常见的有“颂鲁眼福”、“书淫”、“八求三说一巧之斋”、“长洲叶氏所藏金石文字”及带有“某某审定”字样等几方印。

历经苦难，众多亲人纷纷离世，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但嗜书之初衷不改。即使是在亲人重病或治丧期间，叶氏仍勤于阅场肆，乃至为之废寝忘食，真可谓死心塌地的书痴。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多有以“书痴”“书淫”自称者，叶氏亦嗜书成癖，在其日记中常常以此自比。

叶氏尚有一印，印文“八求三说一巧之斋”。乙巳（1905年）十一月初九日，叶氏在批阅甘肃秦州乡试后，对当地士子的文化素质低下颇有感慨，“既无师授，又无藏书可读，荒陋遂至于此。馈贫之粮，拯乱之药，非首建藏书楼不可矣。士子亦先宜知渔仲八求之说”。渔仲即郑樵之号。郑樵《通志·校讎略》中曾论述求书之道有八，即“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因此，“八求”实际上就是四面八方去搜求。明代藏书家祁承燾《淡生堂藏书训约》指出，“夫购书无他术，眼界欲宽，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余于八求之外更有三说”，“总之，一巧以用八求，故曰心思欲巧者，此也”。

除去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外，叶氏还就读书时所见文字为号，如乙卯年（1915）十月十二日日记：“读《后汉书》至《朱公叔传》，着《绝交论》，蔡邕以为穆贞而孤。又作《正交》而广其志焉。章怀注：载穆论，略曰：‘或曰子绝存问，不见客，亦不答，何故？’曰：‘古者进退趋业，无私游之交’。曰‘人将疾子’，曰‘宁受疾’。又载邕论略曰‘断交者，贞而孤。孤有羔羊之节，与其不获，已而矫时焉，走将从夫孤焉。’^①仆自国变以后，敝门削迹，

① 叶氏引《后汉书》中朱穆所著《绝交论》注文有节略，现引如下：“穆集载论，其略曰：‘或曰：子绝存问，不见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进退趋业，无私游之交，相见以公朝，享会以礼纪，否则朋徒受习而已。’曰：‘人将疾子，如何？’曰：‘宁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务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忘于君，犯礼以追之，背公以从之。其愈者，则孺子之爱也；其甚者，则求蔽过窃誉，以瞻其私。事替义退，公轻私重，居劳于听也。或于道而求其私，瞻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

不通庆贺。前贤斯语请事未能，自今以后当以贞孤为号。”又，辛亥年（1911）六月十九日，“寄古惟侍郎一缄，求书门楼额‘明哲经纶’四字，谢康乐《述祖德》诗语也”。出月十六日，“得古惟前辈函，新自沪归。以门额‘明哲经纶’四大字见归，遒健雄厚，气息在颜、董间”。此外尚有一因他人影射而得之名号。在晚清小说《孽海花》第十三回中，叶氏被改换名号，被易名为易鞠，号缘常。^①小说作者曾朴，常熟人，字孟朴，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曾朴与叶氏等人交往密切，所以其小说中描写人物多有好友知交的影子，有些人名号稍加改动，有些则名字号照搬。所以叶氏也承认作者对这些人的描写“虽凭空结撰，亦颇在山色有无中”。^②

综上，叶氏室名、字号达三十多个，其《日记》中提到的曾治成印章的亦非少数，但其中不少的字号印目前仅见到印文而尚未见到印章实物，即是印拓亦不多见。目前见于题跋、图录等的叶氏印记计有如下各种：鞠、菊常、鞠常、缘督、颂鲁、幢主、书淫、霜下杰、硕果堂、奇觚庵、缘督庐、花桥老屋、颂鲁眼福、陀罗尼室、缘袈审定、缘袈所藏、鞠常手辑、鞠常麋寿、鞠裳翰墨、人间方外、缘督庐主人、鞠裳记事珠、五百经幢馆、缘袈庐读碑记、八求三说一巧之斋、治墙室金石图书之记、长洲叶氏所藏金石文字、吴郡叶氏访求乡先哲遗书记。如今不知这些藏书印尚存于天壤间否，可为叶氏一叹。

The Study of Ye Changchi's surname and duty plate

WANG Li-mi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Ye Changchi, a famous documentalist at the crossing period of the end of the Later Qing Dynasty and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 had many surnames which were made to duty plate. This paper studying his duty plate by his surnames.

Key words: Ye Changchi; surname; book stamp

（责任编辑：石磊）

敢止焉……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

① 《缘督庐日记》，丙午（1906年）七月廿七日，“……又答谢郎亭师长谈。索观《语石》稿，允之。见示《近思录》样本两册，首行题‘近思录诸儒详注句解’，在元本中尚非麻沙恶刻，索百元。又以《孽海花》二册见示，《碧云騞》之流也，吾辈书痴皆在笑骂之列，文卿、凤石、西蠡、师鄴最酷，改不佞姓名曰易鞠，号缘裳，师曰钱唐卿。虽凭空结撰，亦颇在山色有无中”。

② 同上。